

《增城县志》选介：增城广府村落的 “客家情结”——《高车村与赵氏》 高车村概况

高车村是中新镇五联村委会治下的一个自然村，位于县境西部，由北向南的西福河的支流高车河从村边流过，是个赵姓单姓村，现有村民 600 多人。虽说是单姓村，但一个赵姓却分为本地赵和客家赵两个族群，客家赵约占村民的三分之一。高车村其实是个本地（广府）与客家两个族群同居一处的村落。

本地赵氏族源与入广时代背景

本地赵氏认为自己是宋室皇姓，而且是“魏王匡美之子孙，为宗室之后”。族谱云：“魏王之子高密郡王（魏王长子德恭，历封高密郡王），则我房之所自出……”，高密郡王之七世的赵彦仁，为其“入广之始祖”。有关赵彦仁的入广，族谱有明确的说明：宋室“因靖康获难，（彦仁时 30 岁）从南渡由汴迁于杭州之钱塘……国步日艰，乃于孝宗十四年丁未（1187 年）由杭州钱塘迁于广州省城之德星坊番塔街枣树巷而居，……为入广之始祖”。族谱中所说的“靖康获难”，指的是 1127 年，即靖康二年，宋徽宗、钦宗父子被金人所虏之事。为避金人的节节进逼，宋室被迫南渡，高宗远走东南，最后由“由汴迁于杭州之钱塘”，建立了南宋王朝。赵彦仁因是皇族，自然跟随皇室南迁杭州。但南宋王室在金人强势的步步威逼面前，始终表现得软弱无能，致使“国步日艰”。此种情形下，皇室内部为求生存起见，各房系不得不自谋

出路，作为高密郡王之七世的赵彦仁，于孝宗十四年丁未（1187年）由杭州移往广州，成为本地赵氏的“入广之始祖”。

本地赵的入增时间与时代背景

本地赵进入增城的时间，应在宋理宗朝之时。高车本地赵《赵氏族谱》纪录了赵彦仁后裔赵时洮在那时到增城为官：“时洮，……登宋理宗宝祐四年（1256年）丙辰科四甲二百二名进士，授承事郎，增城县城丞”。而时洮之子“若杞，时洮五子，讳纲，字若杞，号怀林，百令寿。官德祐，从父奉诏，勤王留于增城，为开基之祖也”。赵若杞“从父奉诏，勤王留于增城”，此种情况应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：恭帝德祐二年（1276年）2月，杭州陷落，宋臣文天祥、张世杰、陈宜中、陆秀夫诸人犹力抵抗，江南各地云扰，而“闽粤赣义民，起而勤王抗敌”。此时，赵若杞奉父亲赵时洮之命，也在“勤王”的队伍中，并“留于增城”。附带说一下，新编《增城县志》“卷3·人口”中载，赵若杞在南宋德祐（1275年）由杭州—广州，在增城县城赵屋开居，县志在他的迁入地点上应有误。上文已谈到赵氏入广州的时间是孝宗十四年丁未（1187年），始祖赵彦仁。而且赵若杞之父赵时洮是赵彦仁后裔，于宋理宗宝祐四年（1256年）到增城为官，其间已过了69年。同时，族谱也明确记载赵若杞是由广州迁入增城的。赵若杞的入增比棠村王泰的时间稍晚，但也属于开发增江三角洲的有功垦民。赵若杞被本地赵氏视为增城开基祖，他“生四子，长子嗣兴居增城，次子嗣荣居荷岭，三子嗣圣居长埔，四子嗣贤居大岗。”族谱说赵嗣荣是在元代延佑年间（1314年）移居到增城西北方现中心镇的荷岭（当地又叫荷佛岭）的，成为荷岭的开基祖。高车本地赵，即是赵嗣荣之后。

客家趙与高车建村

客家趙的入增传说

高车村的本地趙和客家趙，世代都流传着客家趙的先祖到高车的传说：清康熙年间，荷岭的趙氏十一世祖趙登云到紫金请风水先生，在当地结识了当风水先生的客家趙先祖趙炳先（一说是在广州考试时认识的）。两人一叙家谱，发现在趙匡胤时代两家本是兄弟：趙匡胤（宋太祖）是长房；炳先公属二房，即趙匡义（宋太宗）后裔；登云公属三房，即趙匡美（魏王）后裔。登云诚邀炳先移居增城，炳先欣然允诺，即随登云入增。这个时间也正值清政府为恢复东南沿海“复界区”的经济，向外界发出招垦令的时期。他们相中了高车的风水，二祖公就选定高车，各自建祠开基。现在村里即有本地趙的《登云趙宗祠》，也有客家趙的《炳先趙宗祠》。

客家趙始祖与本地趙始祖的分流

在本地趙氏族源与入广时代背景”中，讨论了本地趙氏始祖在南宋末期的迁移路线；本文又在“王氏入增源流”一节中谈到宋元之交，闽粤赣交界区成为拉锯地带。高车的客家《趙氏族谱》纪录了这一支趙氏在程乡的开基祖趙胜，于宋元之交，由江西吉安府卢陵县迁程乡（今梅县），“创业于南门，立民籍于松源一图”。以上诸点说明，南宋末期随皇室南迁的两房趙氏，就在此时段“分道扬镳”了：经元、明两朝约 160 多年的隔离，由杭州——广州——增城的三房趙氏后人成为了操粤方言的广府人，增城当地称他们为本地人；由杭州——江西吉安——梅县的二房趙氏后人就成为了说客家方言的客家人。

高车建村时间

客家《趙氏族谱》记载了明末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，在梅县的趙念月，“行年58岁，携带天佑公迁永安县（今紫金县）龙头约南山甲立业，又移下石约凤安围居住立业”，念月公成为趙氏在紫金的开基一世祖。至“四世祖始迁增邑……炳先……因于大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年（1715年）始居增邑何（荷）岭约，系云母都一图四甲，土名高车村开创立业”。这段文字纪录下登云公与炳先公在高车开基建村的时间，是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年）。

文化强势的高车本地趙

查看族谱和（宣统）《增城县志》，再结合高车村现存的广府式传统排村建筑，可以推知当年高车在增城是个叫得响的文化古村。村中起文化导向的是本地趙，也就是说，本地趙是村中的强势族群。

功名彰显

本地趙在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光绪年间都出了“金榜题名”的人物，（宣统）《增城县志》“卷16·选举2”里均有纪录：

乾隆朝 趙光浓 拔贡，历任陈州府通判，河南、汝宁参军等职

嘉庆朝 趙光蕙 登二十四年己卯进士

道光朝 趙光仪 廩贡，任石城训导，署高州府学教授

趙德显 英德训导

咸丰朝 趙德辅 十一年辛酉岁贡

光绪朝 趙承璜 三十二年副贡，署广西潞城司巡检

其中的趙光浓、趙光蕙是亲兄弟，他俩的父亲赵阳况，在地方上是个急公好义之俊杰，县志上有他的传记：“性慷慨，乐施济，粵地患蛊毒，况

检曾祖君锡良方，捐资送药，存活至千人”。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和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年）地方出现饥荒，赵阳况“以粟赈乡邻，藉以无患”，“尝让地与族建祠，终身不言价”。

能在县志上留名，并有传记传世的，在过去绝非“等闲之辈”。

列女流芳

历史上，高车本地赵引人注目的另一个原因，是村中频频出列女，最具影响力的有两人：一是赵黄氏，一是赵单氏。

赵黄氏，（宣统）《增城县志》“卷25·列女”留下了她的事迹：“赵黄氏，云母都何佛岭赵彝周妻，黄繁奕长女。年十八于归，夫歿哀毁欲绝。以翁姑在堂，遗孩在抱，勉进饮食以仰事畜母。尝欲劝改醮，正色言曰：‘儿既为赵家妇，今忽二天，何以见夫地下？’嗣是绝迹不归宁，惟勤女工以供菽水。邑令详请旌表。”

“旌表”，是封建社会中，政府为表扬那些遵守封建礼教的人，允许为其立牌坊或挂匾，这会让当事者或周边众人认为是无尚的荣光。

赵单氏，（宣统）《增城县志》“卷25·列女”云：“赵单氏，云都高车赵光枫妻，二十余岁寡，守节三十年”，也属“旌表”之列。

正因为如此，过去高车村口面南处，树立着一座高大的牌坊，路人远远地就能见到它。村民赵伟波（75岁）回忆说：“牌坊是砖石结构，前面有一块‘圣旨’石，两字一上一下，它的下方是一块横刻的‘节孝流芳’石。牌坊后面，有一块‘恩荣’石和‘彤管清操’石，摆放的方式和前面一样”。

这座“节孝流芳”牌坊，（宣统）《增城县志》“卷5·名胜·坊表”有

载：“在云都高车，为赵光枫妻、赵德显母单氏建”。而且说这样的“节孝流芳”牌坊在增城还有两座：“一在梅都小径村，为宋进母潘氏建；一在梅都春坑村为石国祥母张氏建”。

对这座牌坊具体表彰的是谁，因时间的阻隔，村人也说不清楚了。赵伟波先生说，是赵光蕙中进士后，向皇帝请求为表彰母亲自 22 岁就守寡而立的牌坊。从县志看，“节孝流芳”石明确是表彰赵光枫之妻赵单氏的。诚如上文所引，县志在“列女”里用了一段文字纪录了赵黄氏，并说“邑令”为她上报，请上级部门批准立牌坊。那么，这个“彤管清操”石表彰的就应是赵彝周之妻赵黄氏了。“彤管”一词，出自“诗经·邶风·静女”：“静女其娈，贻我彤管。彤管有炜，说怿女美”。后人以“彤管”象征对爱情的赤诚之心。“清操”，清高的操守或高洁的节操之意。根据赵黄氏的言行，很适宜用“彤管清操”来评价她。牌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，现在“节孝流芳”石已找不到，“圣旨”石、“恩荣”石和“彤管清操”石都堆放在过去叫官厅的地方。另外，县志在“列女”中，还纪录了高车 9 个早寡守节的女人，她们都是二十几岁寡，守节二十几年、三十几年、四十几年不等，最长的是“赵赖氏，赵亚养妻，二十岁寡，守节五十年”。这些可怜的女人，用她们痛苦、悲惨的一生，换来了名垂县志。

两个赵氏间的相处

历史上，两个赵氏在村里的发展并不平衡，本地赵因历史的积累，在政治与文化上一直处于强势；经济上，本地赵既务农又经商，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，解放前高车就有“小广州”之称。他们有了钱就广置田园（如解放前本地赵的赵伟增，平时虽常住广州，在香港、广州均有生意，在增

城还置有千亩之多的田地收租)，地位明显优于客家赵。解放后村里划成分，客家赵没有 1 户地主，而本地赵就有 10 户被划为地主。高车的客家赵就势弱许多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客家赵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分家，一分家就有人搬出高车，到外面另建村落，使得留在高车的客家赵在数量上与本地赵相比总是少数；另一方面，功名上没出过什么彰显之人，不能与本地赵比肩。更因为经济上客家赵没有能力经商，田地又少，主要是向本地赵租田耕种，成为本地赵的雇工。

本地赵虽说在村里是强势，但由于两个赵氏历来就都认同祖上曾是亲兄弟的原因，在“宗亲”的理念下，一般说来也还能善待客家赵，而且如果本村与外村因争田水发生械斗时，本地赵还需有尚武习俗的客家赵氏男丁们在前“冲锋陷阵”。因此，如遇荒年，客家赵有交不上租钱的，本地赵一方也就算了（当然，本地赵里也有恶霸）；由本地赵出钱办的学堂也向客家赵的男女学童敞开大门；如若家境贫穷，客家子弟可以免费入学（外姓子弟却是要交够钱的）；客家子弟有读书好的，也能按学历从本地赵氏祠堂领到“花红”……。

因村内本地赵的势强，客家赵势弱，村民彼此交谈时使用的共同语是粤语，客家赵一般都会说粤语，而会说客家话的本地赵不多。由于是同宗，两个赵氏之间不通婚（现在才开始有）。

两赵自建村以来，已共同经历了 280 多年的风风雨雨。因长期同居一村，生活习俗上在某些方面已互有影响。如本地赵年三十晚要在床头放两根有头有尾的甘蔗，以示“甜到头”，客家赵有的家庭也会这样做；客家赵在春节前备的年货中学习了本地赵做糖环（糯米）的习俗；本地赵接受了

客家趙夏至吃狗肉的习俗；丧葬习俗客家是二次葬，做交椅式大坟，本地趙也与客家趙相同……等等。

【注释】

- 1、参见增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：《增城县志》，1995年11月，P.128。
- 2、罗香林：“客家源流考”，摘自张卫东、王洪友主编《客家研究》第一集，同济大学出版社，1989年，P.23。
- 3、同上。
- 4、在棠村调查时，村委会里有王孔光先生和村委主任王庆华（54岁）、村党支部书记王泽如（54岁）等五六人。村里情况 就是他们提供的，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。
- 5、参见曾昭璇：“增江三角洲历史地貌研究”，增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，《增城县志·附录》，1995年11月，P.998。
- 6、刘丽川：“增城客家源流与三百年来和睦相处的客家山村”，《增城日报》，2007年4月19日。
- 7、同2。
- 8、参见增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：《增城县志》，1995年11月，P.132。
- 9、有关高车村的情况均由高车村80岁的趙容根、75岁的趙伟波、43岁的趙秋强、35岁的趙伟团等先生提供，特此感谢。
- 10、参见增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：《增城县志》，1995年11月，P.125。
- 11、参见刘丽川：“增城市客家村落的‘异姓共祠’与打醮考察——以小楼镇竹坑村为例”，《“客家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”国际学术研讨会》论文，赣南师院，2007年11月。
（摘编自《增城方志：〈增城广府村落的“客家情结”〉》，作者：刘丽川，系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）
标题由编者所加。